

闻一多

作品



现代著名诗人，开创格律体的新诗流派，是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进程中重要的阶段性人物之一。闻一多的作品，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凝聚成一种不可多得的美，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耐人回味。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闻一多作品

闻一多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编委会

主 编：王 宁
编 委：李 珊 李广兴 宋永和
孙 峰 齐浩然 潘文文
曹 勇 王 伟 马天行
章 丽 荔志平 韩殿栋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闻一多作品

责任编辑：赵 岩

装帧设计：阿 流

策 划：大 牛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北京通州东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1050 千字

印 张：440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220-8/I·1177

全套定价：1112.00 元 （本册定价：27.50 元）

目 录

自 传

- 闻多 (3)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4)

诗 赋

- 红烛 (11)
雪 (14)
睡者 (15)
黄昏 (17)
时间底教训 (19)
二月庐 (20)
快乐 (21)
回顾 (22)
幻中之邂逅 (23)
失败 (24)
花儿开过了 (25)
死 (27)
宇宙 (29)



国手	(30)
爱宅种——题画	(31)
谢罪以后	(32)
忏悔	(34)
别后	(35)
玄思	(37)
记忆	(38)
太阳吟	(39)
废圆	(41)
小溪	(42)
稚松	(43)
烂果	(44)
色彩	(45)
红豆	(46)
口供	(61)
收回	(62)
“你指着太阳起誓”	(63)
你莫怨我	(64)
你看	(66)
也许——葬歌	(68)
末日	(69)
死水	(70)
春光	(72)
黄昏	(73)
夜歇	(74)
心跳	(75)
发现	(77)



祈祷	(78)
一句话	(80)
荒村	(81)
罪过	(84)
天安门	(85)
洗衣歌	(87)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89)
月亮和人	(91)
七子之歌	(92)
长城下之哀歌	(95)
我是中国人	(103)
爱国的心	(107)
故乡	(108)
回来了	(110)
叫卖歌	(112)
秦始皇帝	(114)
抱怨	(115)
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	(116)
欺负着了	(118)
比较	(120)
回来	(121)
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	(122)
松赋	(123)
清华图书馆	(124)
天涯	(125)
青岛	(126)
致高孝贞	(128)



剧 本

-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133)
什么是九歌…………… (156)

杂 感

- 旅客式的学生…………… (173)
中文课堂废秩序废一班…………… (176)
公共机关底威信…………… (177)
美国化的清华…………… (178)
败…………… (181)
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 (182)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 (183)
可怕的冷静…………… (189)
一个白日梦…………… (192)
真的屈原…………… (195)
孔子与独裁至义…………… (197)
五四断想…………… (199)
妇女解放问题…………… (201)
谨防汉奸合法化…………… (205)
兽·人·鬼…………… (207)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209)

自 传



闻 多

闻多，字友三，亦字友山，湖北蕲水（按：即今浠水）人。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貲，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时多尚幼，好弄，与诸兄竞诵，恒继，夜归，从父阅《汉书》，数旁引曰课中古事之相类者以为比。父大悦，自尔每夜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十二岁，至武昌，入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甫一载，革命事起，遂归。翌年春，复晋省，入民国公校，旋去而之实修学校。越月，试清华，获选。来校时，距大考仅一月，又不审英文，次年夏，遂留级。喜任事，于会务无洪纤剧易悉就理，所见独不与人同，而强于自信，每以意行事，利与钝不之顾也。性简易而愿爽，历落自喜，不与人较短长，然待人以诚，有以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蹶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牖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敷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萧笛以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说到联大的历史和演变，我们应追溯到长沙临时大学的一段生活。最初，师生们陆续由北平跑出，到长沙聚齐，住在圣经学校里，大家的情绪只是兴奋而已。记得教授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大家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有时一个同事新从北方来到，大家更是兴奋的听他的逃难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只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那时我们甚至今天还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因为学校虽然天天在筹备开学，我们自己多数人心里却怀着另外一个幻想。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自然我们自己也不是例外。于是我们有的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理便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了。

因为长沙圣经学校校舍的限制，我们文学院是指定在南岳上课的。在这里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属于圣经学校的。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们脚下是南岳镇，后面往山里走，便是



那探索不完的名胜了。

在南岳的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时物价还没有开始跳涨，只是在微微的波动着罢了。记得大前门纸烟涨到两毛钱一包的时候，大家曾考虑到戒烟的办法。南岳是个偏僻地方，报纸要两三天以后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们，我们也就渐渐不大注意世界了，于是在有规则性的上课与逛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来。半辈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暂时的扰动，只能使它表面上起点变化，机会一来，它还是要恢复常态的。

讲到同学们，我的印象是常有变动，仿佛随时走掉的并不比新来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线参加实际战争去的。但留下的对于功课多数还是很专心的。

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坚毅的领导，对于这样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谈到国共问题，大家都以为西安事变虽然业已过去，抗战却并不能把国共双方根本的矛盾彻底解决，只是把它暂时压下去罢了，这个矛盾将来是可能又现出来的。然则应该如何永久彻底解决这矛盾呢？这位先生认为英明神圣的领袖，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高智慧，时机来了，他一定会向左靠拢一点，整个国家民族也就会跟着他这样做，那时左右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现在想想，中国的“真命天子”的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当时没有反问这位先生一句；“如果领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渊里冲，整个国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样做呢？”

但这在当时究竟是辽远的事情，当时大家争执得颇为热烈



的倒是应否实施战时教育的问题。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坏。结果是两派人各行其是，愿意参加战争的上了前线，不愿意的依然留在学校里读书。这一来，学校里的教育便变得更单纯的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与抗战脱节的教育。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并不是全体学生都主张战时教育而全体教授都主张平时教育，前面说过，教授们也曾经等待过征调，只因征调没有消息，他们才回头来安心教书的。有些人还到南京或武汉去向政府投效过的，结果自然都败兴而返。至于在学校里，他们最多的人并不积极反对参加点配合抗战的课程，但一则教育部没有明确的指示，二则学校教育一向与现实生活脱节，要他们炮声一响马上就把教育和现实配合起来，又叫他们如何下手呢？

武汉情势日渐危急，长沙的轰炸日益加剧，学校决定西迁了。一部分男同学组织了步行团，打算从湖南经贵州走到云南。那一次参加步行团的教授除我之外，还有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等先生，我们沿途并没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传说的。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紧张戒备，然而也是一场虚惊而已。

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什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等。

在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



问题的。我们只希望到昆明后，有一个能给大家安心读书的环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谈，甚至也不大想政治问题。有时跟辅导团团长了为了食宿闹点别扭，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说来，都是很高兴的。

到昆明后，文法学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个世外桃源。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

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还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们离家太久，每到暑假当然想回去看看，有的人便在这时一去不返了。

等到新校舍筑成，我们搬回昆明。这中间联大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就是在皖南事变时期，同学们在思想上分成了两个壁垒。那年我正休假，在晋宁县住了一年，所以校内的情形不大清楚，只听说有一部分同学离开了学校，但是后来又陆续回来了。

教授的生活在那时因为物价还没有很显著的变化，并没有大变动。交通也比较方便，有的教授还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里的人。如刘崇铨先生就回去过几次。

一般说来，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的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谈时事。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大学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教授会中讨论到这个问题，许多先生，发言非常愤慨，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党的情绪。

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抗战期中的青年是大大的进步了，这在“一二·一”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清楚。那几年同学中跑仰光赚钱的固然有，但那究竟是少数，并且这责任归根究底，还应该由政府来负。

这两年来，同学们对学术研究比较冷淡，确是事实，但人们因此而悲观，却是过虑。政治问题诚然是暂时的事，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有些人主张不应该为了暂时的工作而荒废了永久的事业，初听这说法很有道理，但是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能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而且政治上上了轨道，局势一定安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

这年头愈是年青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想到这里，我觉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的现象之中，教育，尤其大学教育，是最不合理的。抗战以来八九年教书生活的经验，使我整个的否定了我们的教育。我不知道我还能继续支持这样的生活多久，如果我真是有廉耻的话！

诗 赋

